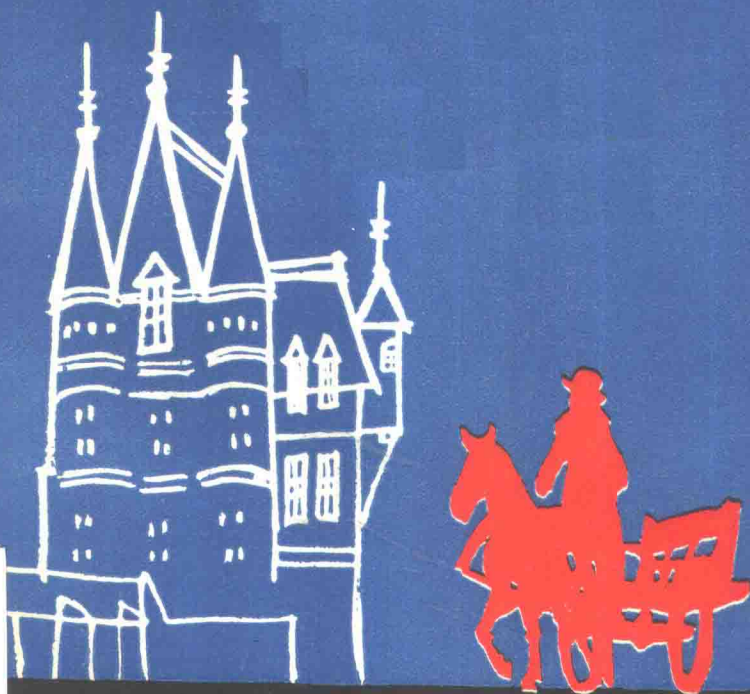


Le Grand Meaulnes

大个儿莫纳



苏人民出版社

[法] 阿兰·傅尼埃 著

纳莫斯

〔法〕阿兰·傅尼埃著
李棣华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Le Grand Meaulnes

Alain Fournier

大 个 儿 莫 纳

〔法〕阿兰·傅尼埃著

李 棣 华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徐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46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册

书号: 10100·476 定价: 0.50元

责任编辑 周曼斐

译 者 的 话

本书作者阿兰·傅尼埃，原名亨利·傅尼埃（Henri Fournier），一八八六年十月三日生于法国歌尔省夏贝当吉荣（la Chapelle-d'Angillon），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。一八九一年十月，傅尼埃的父母被调到埃比讷伊（Epineuil，即小说中的圣·阿加特），五岁的小亨利就在父母任教的学校里上学，直至一八九八年。

一八九八年以后，亨利外出求学：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在巴黎伏尔泰中学，以后在勃雷斯特（Brest）呆了一年。他酷爱文学，为了进入高等师范大学而在拉加那拉（Lakanal）中学读大学预科。

一九〇五年六月一日复活节，亨利在巴黎街上偶然遇见一位棕发姑娘扶着一位老太太走路。亨利对姑娘一见钟情，尾随着这一老一少，登上巴黎塞纳河上的游艇。十天以后，亨利又在电车上遇见这位姑娘，两人进行了交谈。亨利告诉她自己的身世和今后的计划，也知道了姑娘名叫伊沃娜·德·纪埃弗古尔（Yionne de Quiévrecourt），平时住在土伦（Toulon）城，现在巴黎姑妈家度假。分手前，姑娘请亨利以后不要再相见了，但是亨利已经情魔缠身，身不由己，经常在姑娘的寓所附近去候她，不过始终没能再见到她一面。直至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，他才从别人之口获悉伊沃娜已在半年前结婚了。

以后，亨利在上学、服兵役、当报社编辑的过程中仍旧念念不忘他那不可实现的爱情。经过长期的酝酿，他以阿

BA2-B/HZ 01

兰·傅尼埃为笔名，写出了《大个儿莫纳》这一名著：一九一三年先在文学杂志上分四期连载，紧接着于十月份单独成书。著作出版后，作者还给他的恋人——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——寄去了一份。
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爆发，八月一日亨利应召入伍，九月二十二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中德军埋伏而战死，时年仅二十八岁。

《大个儿莫纳》问世以来，一版再版，经久不衰，长期以来已成为法国青年必读之物，被誉为“二十世纪法国最著名小说中的杰作”，研究它的论文连篇累牍，由法国和各国人士组成的《阿兰·傅尼埃之友协会》每年出版刊物，组织活动来纪念他们这位心爱的、年轻的文学家。现在小说已被译成英、德、日、西班牙、俄、北欧、东欧等多种语言，畅销全球；前几年还被拍成电影，广泛流传。

我在这里不想对本书作任何评价，相信读者自会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不过我要借中译文出版的机会，感谢埃比纳伊小学吕里埃（Lullier）先生热情向导我参观阿兰·傅尼埃的旧居；感谢作者的外甥阿兰·里维埃尔（Alain Riviere）先生在寓所热情地接待我，为我提供详细的资料。他们的帮助对我正确理解原文有极大的裨益。

李 棣 华

1981年6月1日于巴黎

主要人物表

弗朗索瓦·索雷尔

索雷尔先生

米 莉

奥古斯丁·莫纳

莫纳太太

雅斯曼·德卢什

穆什伯夫

伊沃娜·德加莱

弗朗兹·德加莱

德加莱先生

加纳什

德卢什寡妇

迪 马

瓦朗蒂娜·勃隆多

弗洛劳坦

朱 莉

菲尔曼

玛丽·路蕊丝

穆瓦内尔

本书叙述者，大个儿莫纳的挚友

弗朗索瓦之父，小学校长。

弗朗索瓦之母，小学教师。

本书主人公。

奥古斯丁·莫纳之母。

莫纳的同学。

莫纳的同学。

莫纳的妻子，本书女主人公。

伊沃娜之兄。

伊沃娜和弗朗兹之父。

吉普赛人，弗朗兹的伙伴。

雅斯曼·德卢什之母。

雅斯曼·德卢什之叔。

弗朗兹·德加莱之妻，一度成为
莫纳的爱人。

弗朗索瓦·索雷尔的伯父

弗朗索瓦·索雷尔的伯母。

弗洛劳坦和朱莉的儿子。

弗洛劳坦和朱莉的女儿。

弗朗索瓦·索雷尔的姨婆。

第一部

第一章 寄宿生

他是一八九…年十一月一个星期天到我们家的……

我现在仍旧说“我们家”，其实这个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。我们“离乡背井”已经一十五载，而且肯定永远也不会再回去了。

当时我们住在圣·阿加特完全小学的校舍里。学校的高级班的培养目标是小学师资^①。这个高级班以及中级班都由我父亲执掌教鞭；我和所有其他学生一样，都管他叫索雷尔先生。低级班则由我母亲负责。

学校坐落在集镇的边缘。五叶地锦树下现出一座长长的红房子，五扇房门全都镶有玻璃；宽阔的院子附设风雨操场和洗濯间。前面的大门向村子洞开；朝北的方向有一扇小栅栏，外边就是公路，一直通到三公里外的车站；南面以及校舍背后全是田野、花园和草地，它们的边缘和集镇的郊区相连……以上就是我的住所的简略的草图。我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、最可珍惜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度过的，我们的种种奇遇也是从这里开始，又退回到这里，就象海浪拍礁，去而复返。

偶然的“工作调动”，学监或省长的一道命令，使我们到了这个家。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，假期快结束时，我和母亲

^①法国小学为六年制，二年预备班，二年初级班，二年中级班。高级班实际上是初中，十九世纪时某些小学附设高级班，可以培养小学师资。

坐在前面一辆大车上，后面随着行囊家具，来到了这里。我们在生锈的小铁栅栏门前下了车。一些正在园中偷摘桃子的小孩悄悄地从篱笆的窟窿里溜走了。我母亲——我们大家都管她叫米莉，她也是我所知道的治家最有方的主妇——马上走进堆满尘草的屋子。如同前几次“搬家”一样，她一眼就明白我们的家具在这所破烂的房屋里是怎么也放不下的，心中不免十分失望。她返身出来向我诉苦；她一边诉说，一边用手绢在我风尘仆仆的稚嫩的脸蛋上轻轻的拭擦，然后又回到屋里去，计算着要使房屋能重新住人，需要堵塞多少窟窿……我留在外边，头上戴着系有绸带的大草帽，站在这个陌生的院子的沙砾地上等着，或者到敞棚下、井台边慢吞吞地转悠。

我今天想起来，我们初到时的情景至少就是如此。因为每当我追忆我在圣·阿加特的院子里第一个晚上是如何等候人的，我记起来的往往是其他等候人时的情景：我往往想起，我两只手拽住大门的铁条，焦急地等着某个人从大路上下来；每当我追忆起我在顶楼里——二层楼好些谷仓间的居中的一间——是如何度过第一个夜晚的，我往往记起另外几个夜晚：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是孤独一人，另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沿着墙壁踱来踱去，他忧心忡忡，但热情友好。学校、马丁大爷的田地、他的三棵核桃树、还有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来找老师的妇女们占满了院子……可是在我的脑海之中，所有这一切升平世界又被别的景象所搅乱、所改变。这些景象，当时激荡着我们少年的心灵，今天虽然事隔多年，仍使我们无法平静。

其实，当莫纳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在当地已经整整住了十

个年头了。

我当时已有十五岁。那天是十一月份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。秋天乍冷，使人感到冬日的来临。整整一天，米莉等着火车站发来的马车，因为人家要替她捎来一顶御寒的帽子。早晨，她没有去做弥撒。我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，焦虑不安地朝钟楼方向张望，想要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进来，可一直等到讲道开始^①，也没有见到她的踪影。

下午，我还得独自一人去做晚祷。

为了宽慰我，母亲一边用刷子替我刷童装，一边对我说：“这顶帽子即使已经送来了，我也许还得花整个星期的时间来改制它。”

我们的星期天经常是这样过的：一清早，我父亲就走得远远的，到某处迷雾笼罩的池塘边，坐在小船上钓白斑鱼去了；我母亲则退居到光线暗淡的卧室里缝补旧衣裳，直到天黑。她设法躲开别人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主要是害怕她的某位朋友会看到她的寒伧相，尽管这位太太可能和她一样地清贫，但却和她同样地高傲。所以我每每做完晚祷回来，还得在冷冰冰的餐厅里看书，直看到她打开房门，把缝好的衣服穿给我看。

但是这个星期天的晚祷后，教室外边颇为热闹，致使我迟迟不肯回去。门厅下举行的洗礼仪式吸引了许多孩子^②；教堂外边的广场上，有好些镇上的人穿着消防队员的上衣，他

①讲道开始前赶到教堂做弥撒，不算迟到。讲道一开始，很少有人再进教堂，而宁可做下一场弥撒。

②孩子在接受洗礼前还不是教徒，不能进教堂，所以仪式要在教堂外的门厅里举行。洗礼仪式后要发糖，所以孩子们等着。

们架起枪支，因冻得发抖而不断地跺脚，正在聆听队长布雅东的训话，在军事理论上他是越讲越糊涂，使人不知所云……

洗礼的钟声，就象是节假日的铃声因为搞错了日期和地点，戛然停止了。布雅东和他手下的人，斜背着武器，带着水泵，小跑步地走开，跑到第一个拐弯处，就看不见了，只是后边跟着四个默不作声的孩子，他们宽大的鞋底踩着铺霜大路上面的小细枝。我没敢跟着他们跑。

这时，整个集镇只剩下达尼埃勒咖啡店还有点生气，我隐约听到里边顾客时高时低的谈论声。于是，我挨着把我们家和村庄隔开的大院子的矮墙，回到了铁栅栏。时间已经很晚，我的心中有点忐忑不安。

小铁栅栏门半掩半开着，我一眼就看出有桩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。

果然，餐厅的房门口——朝院子开的五扇嵌玻璃的门中最近的一扇——一个灰头发的妇女正侧着身子，想透过帘子向里张望。她个儿不高，戴着一顶老式的黑绒风帽，面庞瘦削而秀气，但忧心忡忡，若有所失。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好怕的，反正我一瞧见她，就在铁栅栏前第一级台阶上停住了脚步。

“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的天哪！”她压着嗓门说：“他刚才还在我身边。他已经围着房屋转过一圈了。他大概溜走了……”

她每说一句话，就在方玻璃上轻叩三下，轻得几乎听不到声音。

谁也没有跑来给这位陌生的女客开门。米莉大约已经收到火车站送来的帽子，正在红房子的最里端，什么也没有听

见。她大概呆在撒满了旧绸带和变直了的羽毛的床前，把这顶值不了几个钱的帽子拆了又缝，反复摆弄……

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当来客紧跟着我走进餐厅，我母亲就出现了，双手还扶着头上帽子上那些尚没有摆合适的铜色线、绸带和羽毛……她向我微笑着，蓝色的眼睛因为在黄昏时刻还在干活而显得疲乏。她叫道：

“瞧！我正等着给你看……”

但是当她一瞧见这位妇女坐在餐厅靠里的大椅子上，便马上住口，神情很是尴尬。她赶紧脱掉帽子，把它翻转过来，弯起右胳膊，一直把它象只鸟窝似地贴在胸口。

那个头戴风帽的妇女，两膝之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拎包，开始讲述她的来意。她微微地摇晃头脑，鼓动舌簧，俨然象个来作客的女宾。她已经恢复了常态。当她一讲到她儿子，样子就显得高贵而神秘，使我们颇为好奇。

他们俩都是从圣·阿加特十四公里以外的拉费尔泰·当齐荣坐车来的。她是个寡妇，按她自己的说法还挺有钱；她的小儿子安托尼一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后死了，因为他和他哥哥在一个肮脏的池塘里游了泳。她决定让她大儿子奥古斯丁到我们这里来寄宿，以便学完高级班的课程。

接着，她马上把她带来的寄宿生大加称赞。我一分钟前在门口看到这位灰头发妇女时，她还弯着身子，失魂落魄，象只丢了野雏的母鸡哀求怜悯，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。她对儿子大加赞赏的一切，真令人吃惊：儿子喜欢讨她好，有时光着脚丫子，沿着河边走好几公里，把丢在水草里的水鸡蛋和野鸭蛋捡来给她……他也撒鸟网……有一天夜里，他还在林子里一把抓住了一只野鸡的颈子……

我这个人胆小得连外套上被钩个小洞都不敢回家，不禁惊奇地望着米莉。

但我妈妈已经什么也不听，还让那位太太也别吱声；她把手里的“鸟窝”放在桌上，轻手轻脚地站起来，仿佛要走出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人……

果然，我们听见上面有陌生人的脚步声，在堆放去年七月十四日^①放烟火用具的小间里踱来踱去，震得天花板咚咚作响，脚步声还穿过楼上几间阴暗宽敞的谷仓间，最后朝无人居住的、用来晾干板木和放熟土豆的配间的方向消失。

米莉低声说：“刚才我就在底层的房间里听到过这个声音，我以为是弗朗索瓦你回来了……”

谁也没有答话。我们三个人都站着，心里怦怦地跳；突然顶楼通到厨房楼梯的门打开了，有一个人走下梯级，穿过厨房，来到餐厅阴暗的进口处。

“是你，奥古斯丁？”太太说。

来的人是个十七岁模样的大男孩。黄昏来临，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他那顶戴在后脑勺的衣式毡帽，黑色的上衣，腰部束着一根小学生常用的皮带。我也依稀辨出他在微笑……

他一眼瞧见我，还没有等到别人问他干什么来着，就先开了口：“你到院子里来一下好吗？”

我迟疑了一秒钟。米莉没有拦我，我就拿起帽子，朝他走去。我们从厨房出去，走到风雨操场，那里夜幕也已降临。在落日的余辉中，我一边走，一边看到他鼻正脸方，唇带茸毛。

^①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日。

“我在你的顶楼里找到了这些玩意儿，”他说，“你从来没有在那儿瞧过？”

他手里拿着一只已经发了黑的木轮子，周围绕着一根破碎了的烟火导线：这也许是七月十四日放的太阳或月亮烟火。

他说：“有两支烟火没有放出去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点。”他说这话时很平静，他的样子似乎希望下面能有场好戏可看。

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；我看到他象农民一样头发剃得平平的。他给我看两支烟火，上面还带着一截纸做的引火线；它被火烧断后发黑，并被扔掉的。他把木轮的轮毂埋在沙子中，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——这一点我十分吃惊，因为我们这儿是绝对禁止的——小心翼翼地蹲下去，把引火线点着，然后拽着我的手，使劲把我往后拉。

一会儿以后，房门开处，莫纳的妈妈跟着我的妈妈，两人一齐走了出来；她们已经商量好寄宿的费用；随着嗤的一声，只看见两束红白相间的火星，从风雨操场凌空而起；妈妈在一刹那间，看见我在奇光异彩中踮着脚，拉着新来孩子的手，一动也不动……

这次，她还是没说什么。

晚上，吃晚饭时，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个闷声不响的伙伴。他光是低着头吃饭，也不管我们三双眼睛正一齐盯着他。

第二章 四点钟以后

到那时候为止，我很少和镇上的孩子在街上跑。我患髌关节结核病一直到一八九…年，这使我十分不幸，并变得胆小怕事。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可怜巴巴地瘸着一条腿，在房屋四周的小路追赶灵敏的同学时的情景……

所以人家很少让我出门。米莉虽然很疼我，但我记得她不止一次狠狠地打过我的耳光，强迫我回家去，因为她撞见我单脚跳着和村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。

奥古斯丁·莫纳来的时候，凑巧我的病也治好了，这使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开端。

他来之前，四点钟一放学，我的寂寞长夜便开始了。我父亲把教室炉子里的火移到家里餐厅的壁炉里去，慢慢地，冰冷的学校只剩下几缕青烟在缭绕；迟迟不归的最后几个同学也相继离去，只是院子里还有人在做做游戏，奔跑跳跃。接着黑夜就降临了，负责打扫教室的两个学生在敞棚里拿起他们的披风和兜帽，手里挎着篮子，匆匆地走了，随那院子的大门敞开着……

所以，只要有一线阳光，我就呆在镇公所，关在档案室内，里边满是死苍蝇和随风飘摇的招贴画。我坐在一张旧的摇椅上，靠近朝花园开的窗口看书。

一直等到天黑，附近农庄的狗开始吠叫，我们家厨房的方玻璃窗透出光亮，我才回家。那时我妈妈已开始准备晚

餐；我登上通往顶楼的楼梯，在第三级阶梯上一声不响地坐下来，脑袋靠在楼梯扶手冰冷的木条上；烛火在狭小的厨房晃晃悠悠，我望着妈妈在那儿生火做饭……

但是现在来了一个人：他把一个安静的孩子的这些生活乐趣全给冲掉了；他吹灭了母亲低头准备晚餐时为我照亮她慈祥面容的烛光；他关熄了我们幸福家庭的灯盏——每天晚上我父亲把木板挂在门玻璃窗上之后，我们都聚集在这盏灯的四周。这个人，就是奥古斯丁·莫纳，别的学生不久就叫他大个儿莫纳。

自从他成了我们家的寄宿生以后，也就是说自从十二月最初的日子开始，学校下午四点以后不再是空无人影了。放学以后，尽管弹簧门里透进冷风，尽管值日生吵吵嚷嚷和水桶乒乓作响，教室里总有二十来个大孩子，既有镇上的，也有乡下的，紧紧地围在莫纳的周围。他们长时间的商讨，没完没了的争论。我也挤身其间，心中既忧又喜。

莫纳一句话也不说。但总有一个爱讲话的人走到孩子们中间，专门为了莫纳而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们如何偷庄稼，还不断地让他的伙伴们轮流给他作证；这些伙伴也大声称是；其余的人则听着他讲，咧着大嘴，默默地笑。

莫纳坐在一张课桌上，晃荡着两条腿，思考着。动听的时候，他也微微地笑，好象他只能为某则最美妙的故事才肯爽朗地笑出声来，而这则故事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。等到夜幕降落，教室方玻璃透进来的微光照不清这群年轻人的脸庞时，莫纳突然站起身来，穿过密密的人圈，叫道：

“走，上路！”

于是，大家都尾随他出去。一直到黑夜，在镇上的高坡

上，人们只听到他们的一片呐喊声。

我现在有时也跟着他们跑。挤牛奶的时候，我跟着莫纳到镇郊的奶牛场去……我们也逛商店。镇上的织布工在他布机的两声喀嚓声之间，在黑咕隆咚的深处嚷道：

“大学生来了！”

一般的情况下，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在离学校不远的德斯努那里。他是个车匠，同时也是个铁匠。他的铺子原先是另旅店，双扉的大门老是敞开着。人们从街上就听到炼铁炉的风箱呼呼地响。在煤炭火光的映照下，人们有时可以看到一些乡下人，他们停了车，在这块暗淡而又丁当作响的地方聊天，或者有些象我们一样的学生，背靠在门板上，一声不响地瞧着。

大约圣诞节前八天，一切都从这儿开始了。

第三章 “我到藤制品商店去”

雨下了整整一天，到傍晚才止住。白天真是没劲透了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谁也没有走出去；人们听到我父亲索雷尔先生在教室里不时地叫道：

“你们这帮捣蛋鬼，别这么搞破坏好不好？”

最后一次休息之后，或者按照我们的说法：最后的“一刻钟”之后，索雷尔先生在来回地踱着步、一边思考着，他蓦地站定了身子，把戒尺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，让临下课前因为厌烦而发出的模糊不清的乱哄哄的声音停下来。在众